

吉斯卡尔·德斯坦传

〔法〕奥里维埃·托德著

郑苏春、刘江南、邓其、毛雪良译

张良春、林亚光校

5401/2

新 华 出 版 社

吉斯卡尔·德斯坦传

〔法〕奥里维埃·托德著

郑苏春 刘江南 邓 其 毛雪良 译

张良春 林亚光 校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0.5印张 470,000字

1983年4月第一版 1983年4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9,000册

统一书号：11203·030 定价：2.20元

译者的话

本书由巴黎罗伯尔·拉丰出版社1977年出版。作者奥里维埃·托德是法国著名的记者兼作家。他曾任《快报》杂志副主编、美国《新闻周刊》专栏作家，也为英国广播公司及其他不少报刊、电台撰写稿件。

奥里维埃·托德先是反对吉斯卡尔·德斯坦，后转而同情和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吉斯卡尔。为了编撰这本传记，他作了大量调查，利用自己作为名记者的优越条件，与政府部长、议员以及吉斯卡尔·德斯坦本人、他的亲友、合作者、支持者及反对派进行了多次会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本书从吉斯卡尔1926年出生时写到他1974年任总统时止，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作者试图写出社会、历史环境、家庭及教育对这位法国前总统成长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以其渊博的知识简练地概括了法国五十多年的重大事件，记述了法国的一段历史。

作者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剖析了吉斯卡尔在内政、外交上的一整套思想体系，着重描写了吉斯卡尔27岁时当选为议员、踏入政界以后的活动，记述了他和戴高乐、蓬皮杜之间的关系，详细论述了他的政纲及经济政策。这对于了解战后法国的政治、

经济及社会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由于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历史，又涉及了大量的史料和人物，为了便于读者阅读，译者对本书作了一些必要的注释。由于时间仓促，译文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各方指教。

1981.11

目 录

接见	(1)
1926年 王储降世	(6)
政治游戏	(77)
1945年 星期日，初出茅庐	(80)
她们	(130)
1951年 踏入政界	(140)
众说纷纭	(192)
1962年 小憩	(203)
中间色彩	(239)
1963年 第一个天堂	(242)
拒绝	(299)
1967年 失去了的天堂	(303)
记事簿	(352)
1967年 有得有失	(355)
一座宫殿	(412)

1968年	伺机而动	(417)
	制约与独立	(459)
1969年	月亮	(464)
	秘密的花园	(540)
1973年	法国方阵	(544)
	故作姿态的彬彬有礼	(595)
1974年	两雄相争	(602)
	容易治理的法国	(643)

接 见

1975年4月28日，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对我说：“我不相信有人能写出当代人的传记来。”

第五共和国的第三任总统坐在他办公室的一张长沙发上。这间办公室在总统官邸左侧二楼上，正对着爱丽舍花园。

近看，吉斯卡尔比在电视上更漂亮，容光焕发。因为不管灯光和化装多么恰到好处，摄影机总是把总统与大多数法国人分隔开了，使他显得个子更高，形象呆板。吉斯卡尔长着一只鹰钩鼻子，黑中透亮的眸子映着巴黎的阳光；他的目光柔和而敏锐——有时显得冷淡——；稀秃的头发梳理得很仔细；淡褐色的脸庞修刮得光滑洁净，在给人以性感的嘴角边生着些绉纹；脸上挂着好挑剔的笑容，可面孔却没有在电视上或打电话时那样硕长。他那双神经质的手煞是好看。

吉斯卡尔当政不到一年，他年方49岁，办事得心应手。他善于辞令，与男人交往就象别人与女人调情一样让人着迷。他始终意识到自己是法国人民和法国的第二十任总统。他有着伟人们的那种生来天真或者故意装出天真的秉性，有着不安现状的人和思路敏捷的人所具有的睿智。终于——不知过了多久——我才得出这样的印象：他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和普通人融为一体的结晶。总之，他能维妙维肖地胜任他所担任的角色。

接见的这一天，吉斯卡尔朴实无华，毫无贵族气息，也不傲慢作态。大家常常要让他明白的是——他太迷人了！

吉斯卡尔为什么认为不能编撰一部一个当代人的传记呢？

“因为没有言论和判断的自由，”他这样说着，并没有深谈下去。

然而，我的计划使他很感兴趣。他接见了我，同意了我的计划。他说：“过去同现在的联系吸引着我。”

在这次断断续续而又谨慎小心的谈话中，即使总统向我肯定他不是多疑的人，他仍然强调：“我不敏感，戴高乐也不敏感。”将军的名字在这次会谈中如此迅速地出现，实在出乎意料之外。

开初，在我和当时的总统府新闻发言人格扎维埃·博尚以及总统府秘书长克洛德·皮埃尔—布罗索莱特经过简短交谈后，总统同意见我一次。吉斯卡尔于4月18日接见了我。此后，他和我谈过5次话。我们心照不宣，但逐渐明确的原则是：总统将“依据‘事实’回答问题。”

毫无疑问，他不喜欢我带着录音机进爱丽舍宫，我们谈到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谈话结束后，吉斯卡尔同我约定了下次接见的時間。他站在秘书办公室的门旁对我重复说，他不是—一个“多疑的人”。一个政治家怎能不多疑呢？怎能不对一个为《新观察家》工作了十多年的记者保持警惕呢？这家杂志全力支持弗朗索瓦·密特朗，反对蓬皮杜主义和戴高乐主义，也反对吉斯卡尔主义。

吉斯卡尔在74年的总统选举中脱颖而出；而那时我的杂志支持雅克·沙邦—戴尔马。我很快意识到他将被吉斯卡尔击败。沙邦坚韧不拔，奔忙到最后一刻，俨然能获胜一般。在第一轮选举

结果公布后，我又见到他，他顺便对我提了一下：

“我已尽力而为了……”

弗朗索瓦·密特朗也败北了。不过他干得很出色。1981年，社会党总书记或者另一位什么人或许能够安坐在总统办公室里。

吉斯卡尔轻描淡写地提到了1974年的那次总统选举，并谈到雅克·沙邦-戴尔马：

“在他竞选时，我很为他惋惜。”

这是真的吗？不过也可反问一句：为什么不是呢？

* * *

让-保罗·萨特^①早在40年前就认为人是“白忙一场”，抒情而又做作地强调人同一块石头一样无足轻重。在这惊人而又含混的妙论中，萨特用“白忙一场”这句话让人明白：观察一个男人——无疑或是一个女人也行——比观察一块石头更有趣味。

一个人的诞生和成长与遗传法则、周围环境和社会先决条件有关。一个由多种因素——环境、家庭、教育、金钱——组成的偶然机会，造就了一个人的命运。但是，偶然往往胜过必然。这既没什么值得高兴，也没什么值得忧伤，世事就是如此。这同样适用于越南的农民、南美的将军、澳大利亚的广告员、瑞典的首相，法国的总统也不例外。说穿了，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幸运，他们能逢凶化吉，在事业中获得成功。

那些大名鼎鼎的显赫人物能部分地创造时势或改变时势。他们势力雄厚，操掌统治大权，最终也会销声匿迹、无影无踪。报纸、电台和电视不仅是猎获时事的秃鹫、水性杨花的女郎，而且宣扬、夸大、歪曲他们的讲话、姿势和行动。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经常把自己说的话变成现实。我们唯他们马首是瞻，而不理睬

① 让-保罗·萨特（1905—1980）：法国哲学家、作家、批评家。

受他们影响、领导、治理或专横对待的千百万不知姓名的人。这些权势人物比常人更为忙碌。人们至少有权从他们那儿得到有关民主前景的解释。人们有时极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说他们所说的那些话？为什么做他们答应做的事？或者相反，为什么同意跟他们的声明及社交生活里所标榜的原则大相径庭的政策？

我们不能完全了解一个普通人或一个重要人物。但是，无论是死者还是健在的人，我们都能管窥其生活之一斑。一部传记即便有几百件证据可靠的资料，可在深度与广度上仍嫌不足。然而，政治家的情状象任何人一样取决于他同所处环境的关系，不管他在其中受到陶冶与否；取决于亲信、朋友、敌人和追随者的影响；取决于他在所谓发达社会中与权力、女人、金钱及书本的联系。他公开或隐秘的计划，他的行动而不是声明，他的沉默或抑扬顿挫的讲话，他在各种事情上以及各场政治斗争中的诚实与虚伪，在枉法、操纵、决定和犹豫的面团般的搅混中的表现，都说明了他自己。他也会沉浸在人所不知的幻想之中，这比他的密信或电话交谈更难知晓。这些幻想令人遗憾地会被历史永远抹去。

我们至少可以尝试着叙述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些变化，诸如吉斯卡尔，他就想从政界转入研究历史。我们应该尝试这件难如人意的的工作，而不致写出一部替人说项的溢美的传记，或去挑起笔墨之战。自然，我们都明白这一切最终是不会发生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完全避免善恶二元论，以及辩证法、矛盾、左派、右派、反动派、群众、符号、结构，这样一些越发遮掩不住当代无知的空洞字眼。总之，避免古老的马克思主义和虚无的结构主义（不少法国人仍在清谈，象美国人滥用精神分析法的词汇一样）所派生出来的晦涩难懂的语言。它们用美丽的词藻把术语堆集起来。这些术语在过去起过作用，而现在，它们是掩盖，而不是解

释事物。

一句描述就是一句说明。哲学应放弃单纯而绝对的解释。人物传记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写法呢？

我没有卫护第五共和国第三任总统的意思。我不为此而羞愧。他第一次成为总统候选人时，我投了他的反对票。这同桌子上的牌一样清楚。现在，我既不尽力帮助他，也不为他的失败尽薄力。我在电视上看到他在出访期间同他的智囊团亲密会谈时，既生气又关心，既失望又兴高采烈。我自感既非他的拥护者，又非他的赞美者，更不是他的宿敌。我想分析一下那些把吉斯卡尔带进爱丽舍宫的斗争——同时应当承认：想象总会不知不觉地出现在现实之中，也不会忘记法国不是举世瞩目的中心，更不是西欧的中心。我最终承认：政治家们很少能强烈地打动我。举例来说，我愿同G·凯伦^①相处一个钟头，哪怕相隔很远，也不愿与福特^②相处一天。

政治家们把自己关闭在伪装的而又消耗精力的天地里。我对吉斯卡尔感兴趣的是：我不能斩钉截铁地肯定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这真是矛盾得很——因为他似乎正努力领导法国，并且若干年后或许能领导一个更统一的欧洲。

某些失败是命中注定了的。

① 凯伦：英国当代作家。

② 福特在1974年尼克松下台后任美国代总统。

1926年

王储降世

1925年冬天，德国。出身于巴杜世家的梅·吉斯卡尔·德斯坦等待着她第二个孩子的诞生。她丈夫埃德蒙是财政部督察，在科不伦茨的法国高级专员公署任职。科不伦茨灰雾蒙蒙，环绕着中世纪国王们选皇帝的那个镇子^①。在这个严寒的冬季，莱茵河水泛滥，涌进了建筑物的底层。

梅酷爱音乐、诗歌，爱读K·曼斯菲尔德^②，罗莎蒙德·莱曼^③和安德烈·纪德^④的小说，也喜爱全国救济基金会出售的白色带红、黑色丝线的纺织品。梅能说一口娴熟的英语，声音又尖又动听。

梅在妊娠期间，编写了一本纪念弟弟乔治的书。他死于1924年10月。这本书由友人索黑尔教士作序，印刷了几百册。教士强调乔治的信念是“一个家族的传统，一个家族的财富”。梅在书

① 中世纪的德国分成很多小公国，国王们作为选民，选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

② K·曼斯菲尔德（1888—1923）：新西兰著名女作家。

③ 罗莎蒙德·莱曼（1903-- ）：英国女作家。

④ 安德烈·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中搜集了他弟弟的报章剪摘、信札和他的纪念物。一个在1918年“渴望战斗”的青年人朝气蓬勃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他经常读贵族报纸《法兰西行动报》，细细揣摩右翼人物列翁·都德疾呼反对第三共和国一切愚蠢举动的攻击性文章。在巴黎私立政治大学就学时，乔治对安德烈·西格弗里德^①佩服得五体投地，常去登门“聊天”。乔治觉得美国人实在了不起，他们发明和正在做的一切都令人吃惊。在他们面前没有丝毫困难。

乔治24岁就离开了人世。梅总是担心她的孩子们的健康。因为她生活在一个肺结核病流行的年代里。梅过去只想要男孩，可她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西尔维已经一周多岁了。梅明白，如果这一胎是个男孩，就该给他起名叫乔治。

在1941年德寇占领法国时，第五共和国未来的总统在填表时写道：“吉斯卡尔·德斯坦，瓦莱里—玛丽—勒内—乔治，1926年2月2日生于科不伦茨（被占领区）”。

1974年，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为进入爱丽舍宫进行竞选活动。共产党的编辑们——无所不用其极——在《人道报》上指责他有流亡贵族之嫌。他有着—长串的名字和半贵族的姓氏，并且出生于科不伦茨。这让人回忆起1792年与第一共和国为敌的叛国贵族，因此说明：1974年，流亡贵族吉斯卡尔反对第五共和国。

实际上，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于2月2日诞生在法国占领军的驻地、莱茵河边一所被征用的德国别墅里，体重7斤7两，真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小宝贝。

当瓦莱里—玛丽—勒内—乔治于21点20分呱呱堕地时，科不

^① 安德烈·西格弗里德（1875—1959）：法国著名地理政治学家、法兰西院士。

伦茨城里正在演出《魔笛》^①。

米歇尔医生把孩子接引到这个世界上来。

“没有生理缺陷的孩子。”母亲强调说。

看着婴儿弯弯的勾鼻子，她带着产妇欣慰的喜悦喊了起来：

“我的小拿破仑！”

医生脱口而出地赞扬说：

“这将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小军人啊！”

这句好斗的玩笑好象冲撞了母亲。

吉斯卡尔一家的住所很舒适。一座两层楼的别墅，有着宽敞的楼梯。在摩尔泽的春天里，别墅四周长满了香豌豆和天竺葵。这座别墅的主人苏尔戴斯先生把一些猎获来的野兽靠放在墙边，吉斯卡尔家的人把它们拿开了。一个裱糊工人用白底带花的英国纸把房间装饰一新。

吉斯卡尔家雇佣了一个保姆、一个女佣人和一位德国厨娘。在这一片漂亮的住宅区内，他们的草坪却不能与围绕着第十二工兵团上校指挥官马凯尔家房屋前的草坪相媲美。

所有的法国人，特别是军人，都没有埃德蒙那样舒适的住所。他享有高级官员的特权。1926年2月6日，《科不理士人民报》的记者在巴黎发表了一篇有关法国占领军情况的文章，这位记者写道：占领军的官兵“被人瞧不起，军人们的生活很清苦，这对占领者家庭生儿育女影响极大。父母们不能在这样的贫困中教育孩子……。”

吉斯卡尔家不在此列。

埃德蒙·吉斯卡尔接受了德斯坦家族的贵族身份，重新起了

① 《魔笛》是莫扎特的名曲。

没有封号的名字。他是吕西·马德兰的后代。吕西·马德兰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罗尚博^①和拉法耶特^②的战友德斯坦海军上将的远亲和教女。法国行政法院于1922年7月17日、1923年1月16日两次明令允许埃德蒙和其弟勒内在他们的姓氏上续上德斯坦这个众所周知的姓。

贵族身份和称号几经周折才确定下来。在科不伦茨的法国教区，格朗热司铎发布的登记册中只写着“吉斯卡尔（及夫人）财政局长”。

埃德蒙属于重视家族门第的一代人。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贵族身份趋之若鹜。埃德蒙对贵族身份的追求成为人们长时期的笑柄。

埃德蒙的办公室设在富丽堂皇的最高委员会总部。占领区庞大的行政机构的资金由法国国库安排，用德方的赔款支付。

马克忽涨忽跌。1926年初它还没有一个固定的价格；然而，当时1英镑等于129.35法郎^③，1美元等于26.60法郎。巴黎的交易所门庭冷落，土地收入减少了。但是，苏伊士运河的股票却地位坚固。雷蒙·彭加勒维护和巩固了法郎的地位，不久后实现了法国奇迹般的稳定。德国的通货膨胀不再猖獗了，三年前，马克作为流通货币几个月中就从二百分之一美元的比值上涨到万分之一，再涨到百万分之一。埃德蒙·吉斯卡尔·德斯坦的财政局为维护设在科不伦茨、科隆、美茵茨和克尔的由法国人领导和控制的财政机构的金融秩序作出了贡献。

1926年2月1日，德国沸腾了。在柏林，人们高呼：一切属

① 罗尚博（1725—1807）：法国元帅，支援过美国独立战争。

② 拉法耶特（1757—1834）：法国将军，支援过美国独立战争。

③ 此处是旧法郎。一个新法郎合当时的100个旧法郎。

于德国！莱茵河畔的人们起来吧！英国占领军当时已撤出科隆。柏林市长康拉德·阿登纳发誓忠心耿耿为国效劳。他对10万涌上街头的公民说：“我们对战胜者忍让、克制。我们也应当承认他们信守了自己的政治诺言”。

普鲁士议会议长、总理布劳恩却提醒道：“仍有400多万德国人在盟军占领下痛苦难忍”。

科不伦茨的法国高级专员公署里，人们分析这些讲话，做出了一些必要的让步。占领者和被占领者之间的关系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法国、比利时，或者英国的占领者，无论文职人员还是军人，都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法国驻科不伦茨高级官员保罗·狄哈尔在他从巴黎保护动产局运来的靠背椅、五斗橱和椅子之间举行晚会。这使德国人不能理解，他们生性难以结交，对这些娱乐愤愤不满。狄哈尔对革命战争的历史知识丰富。他总把魏玛时期的德国和波拿巴的意大利混为一谈。奥什^①死于科不伦茨，并葬于此地。狄哈尔让人起出了他的遗骸。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崇拜者。

“真正的德国家庭不接待客人。”梅·吉斯卡尔·德斯坦一本正经地说。

这是因为民族特性和缺少金钱。忧郁寡欢的德国女人星期天出门散步，决不会回转身来看一眼列队通过的法国军队；当这些外国官员或军人聚集起来为莫罗—沃蒂埃的一座丑陋的纪念碑剪彩时，她们却气得发疯，因为这座纪念碑是盟国军队胜利到达的标志。生活在荣耀之中的法国人不会这样敏感。

① 奥什：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将领。

德国的大、中资产阶级当时还没有和冒险分子阿道夫·希特勒同流合污。三年前，希特勒在拜恩州进行的军事政变以可耻失败而告终。领导魏玛共和国的人把兴登堡元帅作为靠山，他们觉得他果敢不足，但是倒还理智。一个中右政府领导着魏玛共和国。他们对社会民主党宽大为怀，对共产党势力突飞猛进的发展忧心忡忡。1926年2月6日，兴登堡采取行动，反对一项主张无偿征用前王侯们的财产的可耻提案^①。

尽管法、德之间存在着难以避免的误解和利益上的矛盾，但关系终于缓和了。一个战败国不能永久僵硬下去。

法国官员的工作极有成效。对德国来说，巴黎来的都是些好消息。在一家很有思想性的报纸《时代报》上，吉斯卡尔家未来的朋友，擅长写大块文章的弗拉基米尔·多尔梅松撰文对德国的前途表示乐观：尽管德国有20万人失业、企业倒闭，但是，动荡并未使德国的货币贬值。众所周知，金融秩序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时代报》的文章说：“相比之下，法国的情况更糟糕，议员们没能就预算作出一致的决定”。

法国将失去她在战争中赢得的一切吗？大富翁们感到惶惶不安，因为一个社会党的议员万桑·奥里奥尔建议对巨额资产进行特殊征税法，并且一次提取。

法国的税收制度极大地改变了它的民族特色。赋税者用一种宗教式的“我发誓”来替代自己的不守信用。税收员联合会发表声明：“赋税多如牛毛，法国苦于消化不良。”

① 当时德国共产党主张没收前王侯们的财产，遭到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